

商务英语课程思政锚定“价值坐标系”破界升级

□ 陈雁宁 吴 乐 胡济民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当中,数字技术正在深刻重塑着国际经贸格局,高校商务英语教育肩负着培养兼具全球胜任力与家国情怀人才的双重使命。商务英语课程作为连接中西文明、传播中国方案的重要载体,其价值引领功能已从隐性维度转向显性要求。在此背景下,商务英语专业教学若仅仅进行单纯的语言技能传授已不能满足当前社会对外贸领域人才的全面要求,还应重视对学生综合实践能力的培养,让学生能够在未来的工作环境中流畅地实现跨文化交流。面对传统商务英语教育“重工具理性、轻价值塑造”的困境,高校应主动打造课程思政大格局,其中教育语言学则为高校商务英语课程思政建设提供了全新视角。

教育语言学有三个方面的学科特性,与商务英语教育课程思政建设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其一,以现实问题为导向。教育语言学研究强调从语言教学的实际问题出发,而商务英语课程思政建设需解决思政元素与专业教学的有机融合问题。教育语言学的理论框架能够为商务英语教学改革提供新思路,推动课程定位从单纯传授商务英语技能,向通过英语媒介传播中国商业文明价值的教学转型,实现课程内涵的升级。其二,以“超学科”为研究范式。教育语言学的“超学科”特性(融合语言学、教育学、社会学等)与商务英语课程思政的跨学科需求相呼应。在教育语言学指导下,商务英语课程思政建设需更加注重跨学科内容的融入,实现从

“跨学科知识叠加”到“超学科育人生态”的转型。其三,以语言教学为核心。教育语言学强调语言教学的本质功能,商务英语课程思政建设可以此为指导,始终以语言教学为自然融入路径,从而有机地导入思政元素。

基于教育语言学理论与商务英语课程思政建设的协同创新机制,高校及教师可以从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三个维度出发构建课程思政建设框架,推进商务英语教育课程教学的创新。

在目标维度,以新阶段商务英语教学的价值指向为依据来重构目标,以国家建设、产业转型发展为目标,要超越传统以培养语言工具性和商务实用性为指向单向度的课程目标,转向与社会目标诉求、专业人才培养的适应性互动。在语言层目标上,要培育商务语境中应对谈判的会话能力,如谈判用语策略、商务邮件写作技能、专业语域的语法技能等。同时,也要注重文化意识形态表达对学生的隐蔽性影响,培育学生的语言话语与政治敏感度。例如,通过中西对比商务文化差异的教学,让学生理解文化差异带来的商业活动差异,引发学生对全球化环境下文化差异冲突问题的反思能力。在价值层目标上,要通过相关案例解析中国在国际规则制定上的建设性贡献,培育学生的国家观念、制度自信,也要融入诚信经营、商业廉洁等道德问题教育,以便于教育学生遵纪守法、增强专业伦理意识。

在内容维度,注重跨学科话题的引入以及建立主题性思政语言库。现代商务活动极其多元化,包含国际商务、商务交流、

国际规则、产品营销、数字技术、商业模式等专业内容,单一的外语语言难以匹配真实业务操作场景,加之现代贸易企业更倾向于招录“语言+专业”的复合型人才,所以,开展商务英语课程思政时,教师应重新梳理教学内容,依托各学科知识构建融入思政内容的英语教学素材库,把专业知识拓展、语言技能训练和价值观教育有机融合起来。此外,在课程项目设计方面,可依据国际问题处理、商业伦理、文化创新三个方面为各学习模块设定主题,让学生在具体案例分析中进一步提高专业水平与思想认识。主题板块教学既加强了商务话语实践性,又在潜移默化中实现价值引领,培养新时代需要的国际化人才。在教学资源建设上,教师还应重视多种类型语料资源的应用,其中文本资源重在建设专业语料,比如选取政府的白皮书作为政策阐述材料,让学生熟悉国际贸易术语与正确表达,或选取大型企业的报告作为实务教材,通过分析企业宗旨、企业战略目标等方式培养学生商务文本处理技巧。

在方法维度,构建实践型、任务型教学模式,将语言教育与综合素养培育紧密联系在一起。商务英语是社会实践工具,教师应推动学生遵循“做中学”的认知规律,通过真实性任务促进语言能力与其他素养的协同发展。教学中,教师可构筑商务情境并嵌入伦理冲突,如让学生分别扮演中外企业代表,围绕劳动成本削减方案展开磋商,在此过程中直面工人权益保护等伦理议题。教师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引导课堂讨论,启发学生辩证思考“效率优先”与“以人为本”的

价值平衡,将理论思辨延伸至对中国“共同富裕”政策内涵的深度解读,使专业知识传授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实现有机融合。教师也可设置项目任务,要求学生就真实问题开展项目调研与实践,例如开设“中国科技企业海外形象建设”项目,指导学生研读《纽约时报》《经济学家人》等外媒文本对中国企业的报道,通过文本细读识别西方媒体惯用的话语体系;要求学生从文化维度切入,运用批判性话语分析法解码国际舆论场域,并将其发现撰写成英文报告;项目要最终在社会实践中落实,比如要求学生基于调研发现结果运用国际传播策略为中国企业制定英文版社会责任宣传方案,重点呈现科技创新成果的普惠价值,通过讲好“合作共赢”的中国故事系统性训练学生的跨文化传播能力,从而培育学生参与国际话语权建构的实践智慧。

在教育语言视角下,高校商务英语课程思政创新发展需坚持将语言教学、文化认同和价值引领联系在一起,使商务英语教学从单一的工具性语言训练转向具有立德树人特色的综合素养培育过程,在强化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和贸易行业伦理素养的同时,塑造学生的国家认同、文化自信与全球责任意识。

(作者陈雁宁系湖南工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吴乐系湖南工学院讲师;胡济民系赣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外语系讲师。本文系2023年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数字化时代下基于SOR理论的商务英语课程思政改革研究》,立项文号:HNJG-20231323)

教育信息化驱动大学数学基础课优化升级

□ 王 娜 刘永楠

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高等教育领域变革,涉及专业课程教学资源与内容、教学策略与模式等维度。如何促进专业课程教学彻底实现变革,以更好地适应时代的发展需求,成为现今高等教育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数学作为一门基础学科,在许多专业教学中都有着重要地位。为更好地培养学生的数学素养与思维能力,亟须改革大学数学教学。这要求大学必须更新教学理念与方法,将信息技术手段运用于数学课堂教学,为培养专业人才提供助力。

大学常见数学基础课程有高等数学、概率统计及线性代数等,涉及专业包括工商类、计算机类、农林科学类、医药生物学类等,但这些基础课教学质量不尽如人意,存在教学内容陈旧、教学方法与手段单一等问题。这要求大学数学教师必须改变传统教学理念,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手段等方面进行全方位改革,以提高数学基础课教学质量与效果。具体来看,信息化背景下,大学数学基础课程教学改革实践策略主要如下。

强化信息化教学意识。以往大学数学基础课教学采取传统教学模式,即课堂上由教师进行知识讲解,学生主要通过课堂听讲及课后练习来掌握相关知识。为保障教学进度,教师统一安排课堂内容并统一进行课后讲解或辅导、考核评价,但数学知识对个人逻辑思维与能力要求较

高,这种单一的教学模式落后于时代发展,很难满足全部学生的个性化需求。为适应信息化时代对人才培养素质的要求,教师需要改变教学理念、转变教学思维,将学生看作教学主体,引导学生主动进行思考与学习,从而激发学生对数学知识的学习兴趣并提升其独立思考与逻辑推理能力。为此,学校需要针对数学教师队伍展开信息化培训,通过培训改变教师对自身身份的认知,提升教师的信息化教学意识,推动其积极从事于数学基础课程教学信息化改革。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应通过创设教学情境来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鼓励学生主动思考、探索各种概念及相关知识的实践应用。

优化教学资源及内容。信息化时代,大学数学公共基础课程教学资源的来源更加广泛,学生可从更多途径获取相关教学资源。学校可建设开发网络教学平台,在平台上传教学视频及相关资料,为学生主动学习提供帮助;在平台上展开线上答疑、课后测验等教学活动,及时解决学生在学习难题,优化教学质量。基于平台建设,为学生提供个性化学习途径与服务,便于学生根据自身实际需求展开学习。另外,学校可开发模块化数字数学教材,将MAT-LAB、Python等数学软件与课程讲解内容相结合,通过实践加深学生对相关理论知识的理解。如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这一课程教学中,教师便可采用这一方法,让学生利用MATLAB软件对大规模随机投掷硬币事件中每一面出现概率进行仿真实

验,通过实验数据与理论数据的对比,学生对概率这一概念及相关计算的理解必将更加深刻。

改革教学模式。信息化背景下,大学数学基础课教学应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优势,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展开教学。对于相对简单或者之前学过的数学知识,让学生通过课前线上自学的方式予以掌握;课中,教师采用多媒体教学、在线网络课程教学等方式,让学生通过观看视频的方式理解掌握相关知识;课后,教师让学生通过在线教育平台学习,同时以在线辅导为学生提供必要的帮助。另外,教师还可开展远程在线教学,将整个教学过程全部迁移至线上,通过直播教学、在线讨论的方式与学生进行互动。这种教学模式更为简单,尤其适用于客座教授或特邀讲师不定期教学,对学生而言,只需简单点击即可享受专业领域内卓越专家或学者的教导,不仅学习门槛降低,而且学习效率与质量也大为改进。整个过程中,教师需要做的便是为学生挑选合适、优质的在线学习资源,并对学生的学习行为与状态进行引导、监督。如此,学生既能充分利用优质网络教学资源,也能锻炼自身自主能力与创新思维。如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由全国多所高校联合打造,网站上有丰富的课程资源,涵盖各顶级高校优质教学资源,在大学数学基础课线上线下混合教学中应用十分广泛。

健全教学评价体系。教学评价体系是

与教学模式相配套的重要机制,可反馈教师教学效果与学生学习效果,便于学校、教师及时反思及调整优化教学目标、课程体系设置及教学模式与方法等。传统的教学评价机制以期末考试、课后测验等书面形式为主,忽略对学生实践能力与素质的评价。信息化背景下,大学数学基础课教学评价体系发生了重要变革,如对数学基础课教学效果进行评价时,除了开展总结性终端评价,还可以在每节课后或在不同知识点讲解后设置测验环节,构建过程性评价机制;对学生实践能力、素质等进行全面评价;评价方式上,除线下测试外,学校还可采取在线评价、自我评价、同伴互评等方式,对学生学习情况进行全面评价,如此可有效降低评价工作难度并提高评价结果的准确性。最终通过合理分配权重完成对学生学习效果的综合评价,以便学校、教师真正掌握学生学习效果,发挥教学评价机制的真正作用。

总之,教育信息化背景下,大学数学基础课程教学内容、教学资源、教学模式等方面都发生了重要变革,通过不断探索与实践,教师可将传统教学模式与信息化教学有机结合,创新教学模式,为学生提供更好的教学服务。未来,各学校、教师仍应不断探索更优质、更科学的教学资源与方法,最大限度提升数学基础课教学效果,为国家、社会培养培养优秀的数学人才,推动社会发展更加繁荣。

(作者王娜系沈阳工程学院理学院副教授;刘永楠系沈阳工程学院理学院讲师)

优化要素 以改革推动传统文化“两创”

□ 王金伟

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下简称“两创”),有赖于一系列既独立又相关联的要素优化改革。

精准切入、深化阐释,明晰“两创”本体范畴。辨清相关基本概念的内涵外延,厘清范畴、廓清界限、甄别高下,是实践的前提。一方面,找准切入点,防止“四面出击”。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门类丰富,“老虎吃天不知从哪儿下口”的问题首当其冲,这就需要全面摸清家底,针对重点突破,“发展”有了主体,“转化”才有依托。另一方面,深入本质层,避免“蜻蜓点水”。基于传统的分学科基础性学术研究,借助古典学、文学、艺术学、医药学等

学科专业,发掘文化宝藏,建立起基本的资源总库,立足当下的分层次应用性文化阐释,是将“原料”通过“精加工”变成“产品”的过程。

总体规划、分工落实,激发“两创”主体活力。文化由人创造,也由人传承。人及其群体组织是文化活动的主体,与文化相关的部门、地区肩负了“两创”的主体责任。“两创”这项宏大工程的实施,有赖于设计层科学规划与执行层分工落实的结合。顶层设计层面上宏观把控,通过出台指导意见、发布工作方案等,进行“两创”的规划设计。如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规划,针对本区域传统文化资源进行宏观部署,为各相关单位、地区按照职责分工分解目标任务。各地区、各部门根据

不同职能,突出专业侧重点,进行有针对性的落实。

瞄准目标、细化层次,落实“两创”客体效益。“两创”要做到什么程度、应达到怎样的目标,须有明确的认识。依照基本目标,要突出攻坚方向,又要兼顾多维度,谋求整体发展。以文化人、提高人民道德水准,使优秀的传统深度嵌入到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中,是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核心目标之一。推进文化与经济的业态、产品、消费深度融合,挖掘提炼文化经典元素和标准符号,融入城市规划、美丽乡村、景区建设,深有裨益。在对外文化交流、文明互鉴中产生积极的国际效益亦是“两创”的重要目标,应充分利用优势资源,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传播交流的高

端平台。

创新方法、开拓路径,提升“两创”载体作用。将“过去时”的传统文化与“进行时”的当前实际联系起来,载体的作用尤为凸显。让传统文化“活”过来、以当代人们易于接受的方式“活”下去,是“两创”的基本任务。因此,“两创”的“创”,最为集中地体现在创新方法、开拓路径上。文化载体丰富多彩,创新方法,开拓思路,久远的传统文化必然会焕发生机,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作者系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讲师、文学博士;本文系济南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文化数字化战略下济南名士文化旅游开发路径研究”(编号:JNSK2025C132)成果】

□ 宋 娟

2024年7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新公司法”)开始实施,标志着我国公司治理制度进入系统性重构的新阶段。此次修法立足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在法律法规创新与实践问题解决两大维度作出突破性制度安排,特别是股东权利保护制度的全方位升级,为经营主体投资活力的激发和商业组织的长效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支撑。

新公司法构建起包含知情保障、决策参与、利润分配与司法救济的立体化制度框架,打造了全方位的股东权益保护体系。

在股东知情权领域,新公司法延续了公司章程查阅、股东会记录调阅、财务报告审查等法定传统权利,更针对非专业投资者在账目核查上的能力短板,创新性地建立了第三方专业机构协同查账机制。以第五十七条为例,该条款首次允许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专业服务机构介入辅助查账流程,通过制度化设计有效破解了因股东财务知识储备不足导致的知情权落空困境,为保障股东实质化行使查阅权提供了机制支撑。

在表决权机制优化上,新公司法着力矫正“资本多数决”的固有弊端,如强化表决权回避制度,规定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涉及关联交易、同业竞争、定向增发等利益冲突事项时必须自动回避表决,从源头上遏制大股东利用控制地位进行利益输送。

在股东收益权保障方面,新公司法确立了更具强制性的利润分配规则,如第八十九条将股东利润分配请求权明确列为法定权利,规定公司连续五年具备可分配利润但拒不分红时,异议股东可要求公司以合理价格回购其股权,这为解决实践中普遍存在的“铁公鸡”公司问题提供了法律抓手。

在股东诉讼权领域,新公司法通过双重制度创新拓宽救济渠道,如降低股东派生诉讼门槛,原告连续180日以上单独或合计持股1%即可提起诉讼,且当监事会收到股东请求后30日内未采取行动时,股东可直接向法院起诉,避免原制度下因程序僵化导致的救济延迟。通过上述突破,新公司法构建起“事前知情保障+事中决策制衡+事后救济强化”的全链条股东权利保护机制,为优化公司治理生态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支撑。

新公司法筑牢股东权益保护机制

当前,股东权利保护制度的实际效能弱化,主要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壁垒、权力制衡机制缺失及权利救济通道受阻等深层次机制性问题。从股东知情权行使来看,尽管法律赋予其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权利,但中小股东常因专业能力不足或企业刻意设置程序壁垒,难以有效获取核心经营信息。在“资本多数决”主导的治理体系下,控股股东借助复杂议案设计、隐蔽关联交易等方式架空中小股东表决权的现象依然频发。司法救济环节中,不合理的举证责任分配与过长的审理周期,也进一步抑制了股东通过诉讼维权的积极性。这些问题相互交织,凸显出单一制度调整的天然局限。因此,股东权利保护机制的优化需以实质公平为核心导向,着力缩小小股东参与实践操作的现实鸿沟,通过系统性改革构建起权责明确、运转高效的权益保障体系。

新公司法的实施虽为股东权益保障搭建了制度化框架,但法律条文向治理效能的转化仍需在立法完善、司法实践与公司治理模式革新之间构建协同运作机制。

针对股东知情权虚化问题,可探索建立差异化信息开放机制,依据股东持股比例、行权目的等因素设定分层次的查阅权限,既保障股东知情权的实现,又避免企业商业秘密的不当泄露。与此同时,借助区块链技术的不可篡改特性,推动公司财务数据、决议文件的链上存证,有效解决传统纸质凭证易篡改、追溯难的问题,为股东举证提供可信的技术支持。

在优化公司治理制衡结构层面,需进一步强化监督制衡力量,着重破解“资本多数决”异化为大股东专制的治理困局。例如,允许中小股东联合推选代表进入监事会,赋予其专项调查权与临时股东会召集权;将累积投票制由任意性规范升级为法定强制性规则,在上市公司及股东200人的股份公司中全面推行,确保中小股东可集中投票权选举代表自身利益的董事,特别应明确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中须有累积投票产生的独立董事参与决策。

在健全股东诉讼配套机制上,应着力解决举证责任过重、维权成本高昂等现实阻力。可以借鉴德国《资本市场示范诉讼法》精髓,建立一案审结、多案参照制度,由最高人民法院每年筛选具有规则创设价值的典型案件,同时允许后续原告援引示范案件中的过错推定规则,将举证责任倒置给被告方。此外,可以建立阶梯式诉讼成本补偿机制,对经法院认定属于正当维权的胜诉股东,由上市公司专项补偿基金承担其部分律师费、鉴定费,若被告存在恶意拖延诉讼情形,则上市公司对胜诉股东的补偿比例可上浮至百分之百。

针对控股股东滥用控制权的行为,需强化控股股东信义义务,在法律层面明确其信义义务的内涵与外延,将不得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作为强制性规范,还要具体列举禁止性行为清单,包括但不限于违规资金占用、不公平关联交易、操纵利润分配等典型违规行为。在此基础上,可引入穿透式责任追究机制,规定控股股东在违反信义义务时需对公司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采用过错推定原则,降低中小股东的举证难度。同时,建立正向激励机制,对持续三年合规履行信义义务的控股股东给予税收优惠或融资政策支持。

新公司法的正式施行意味着我国股东权利保障体系得到制度革新,系统性的法律修订为协调企业自主权与股东利益构建了更完备的操作路径。未来,我国仍需持续完善股东权益保障体系,着力构建法律规范精细化、司法保障体系化、治理机制现代化的协同机制,为资本市场的稳健发展及商业环境的持续改善夯实制度基础。

(作者单位:淮北师范大学法学院)